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5.06.015

# 无法回避的任务: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 理论与方法的再思考

梁运文,杨飞

(广西大学 中国—东盟研究院,广西 南宁 530004)

**摘要:**区域国别学已成为交叉学科下设的一级学科,要成为真正独立的学科,区域国别学必须拥有自己的理论与方法体系,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自主知识体系不可回避的任务。区域国别研究应基于三个层面进行理论创新,即国家层面聚焦现代化理论,地区层面侧重区域治理理论,全球层面深化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理论。区域国别研究应围绕三个导向进行方法应用,即围绕“是什么”导向侧重应用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突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以及归纳的逻辑倾向;围绕“为什么”和“怎么办”导向着重应用案例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和大数据分析法,突出研究对象的普遍性以及演绎的逻辑倾向。

**关键词:**区域国别研究;理论创新;方法应用;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5)06-0131-10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区域国别研究正处于新的“十字路口”<sup>①</sup>。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区域国别研究一直面临来自社会科学的批评——缺乏严格的理论框架与方法论基础<sup>②</sup>,有学者将其称为“地区研究之战”(area studies war)<sup>③</sup>。虽然这一说法是狭隘的,但是加强学术体系建设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自主知识体系不可回避的任务,只有学界对区域国别学的知识边界拥有清晰的认识,拥有自己的理论逻辑和方法路径,才能在知识生产领域自称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并且真正实现“学科化”。杨洁勉教授指出:“做区域国别研究是需要研究理论的,就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指导与创新,如果你缺少这两点,那你就不是学者,而是记者,记者是要快,学者是要深。”<sup>④</sup>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09年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规定,一级学科应该“具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已形成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理论、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sup>⑤</sup>。当前关于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体系构建,学界对其重要性和紧迫性具有普遍共识,但是对其具体内容仍然充满分歧,对其理论创新还没有得到学术共同体的普遍认可。2024年,教育部发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2024试行版)》,指出区域国别学理论体系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及关于世界发展的理论、现代化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文明互鉴理论,并且强调“有选择地运用各相关其他学科的成熟与创新理论,融合于区域国别学理论体系”。对于研究方法,该文件指出应该“同等

收稿日期:2025-06-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XGJ006);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东盟研究院基金资助项目(CARI202512)

作者简介:梁运文(1975—),男,广西灵川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东盟研究。

①Katja M., Anna-Katharina H. *Area Studies at the Crossroads: Knowledge Production after the Mobility Tur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②Bert H. “Latin America and Beyond: The Case for Comparative Area Studies”, *European Review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udies*, 2015(100):112.

③Neil L. *Beyond the Area Studies Wars: Toward a New International Studies*,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00.

④杨洁勉:《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思考》,载郭树勇:《区域国别讲演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⑤《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9年2月25日, [http://www.moe.gov.cn/s78/A22/xwb\\_left/moe\\_833/tmull\\_45419.html](http://www.moe.gov.cn/s78/A22/xwb_left/moe_833/tmull_45419.html)。

重视人文学科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各取所长、各避其短,同时吸纳自然科学和理工科的适宜方法与手段”<sup>①</sup>。“区域国别学理论与方法”成为区域国别学下的二级学科,其意义在于回应学科“合法性”和交叉“可行性”的问题,并且为其他二级学科提供方法论指导,为人才培养提供理论指导<sup>②</sup>,更加突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本文主要聚焦于区域国别研究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的具体内容思考,积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而提高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理性和科学性。有必要强调的是,本文提出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思考仅是一家之言,只为抛砖引玉,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自主知识体系仍然任重而道远<sup>③</sup>。

## 一、既有思考

事实上,长期以来区域国别研究更多是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提供理论验证的材料支撑,例如基于拉美国家发展实践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并不存在一种以区域国别为核心内涵、具有普遍解释性的理论。当前区域国别研究理论体系的构建应该立足于既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理论积累,利用国别与地区的新视角在深化其他学科理论的过程中,实现区域国别研究自身理论的突破与构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将是一个长期工程,任何认为当前新理论、新方法呼之欲出的想法都是想当然的、不现实的。虽然国内学者出版了一批有关区域国别研究理论与方法的高质量著作<sup>④</sup>,但从整体来看,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仍未达到成熟、系统的水平。当然,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学科理论与方法创新仍处于探索起步的阶段,鉴于这一阶段的长期性、复杂性特征,在推进区域国别学发展进程中,应该秉持审慎稳健的态度,避免急于求成<sup>⑤</sup>。毋庸置疑的是,既有研究成果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我们看到区域国别研究理论突破的可能性以及方法创新的方向。

### (一) 区域国别研究的既有理论思考

陈杰教授认为,区域国别研究自身理论的构建存在两种路径,其一为宏观层面上跨越不同国别和区域的理论,这类理论具备跨国界、跨区域的解释效能;其二是中观与微观层面的情境化理论,其对特定国别或区域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sup>⑥</sup>。当前已经有一些学者就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体系构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例如,王缉思教授认为,安全、财富、自由、公正、信仰五大目标研究有助于推动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的整合<sup>⑦</sup>。卢光盛教授提出“共同体范式”,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观,以共同体构建为基本假设,“共同体”是研究的核心对象<sup>⑧</sup>。李晨阳教授指出,在国别研究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理论具有重要价值;立足于“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中心—半边缘—边缘”逻辑)对于认识国家间关系意义重大。在区域研究中,地区主义、区域治理、文明互鉴理论都不容忽视<sup>⑨</sup>。郭树勇教授认为国别与区域研究常用的理论工具包括地缘文化、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一

①《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2024 试行版)》,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2024 年 1 月 22 日, <https://www.acge.org.cn/encyclopediaFront/enterEncyclopediaIndex>。

②陈杰,白鹿:《“区域国别学理论与方法”二级学科建设:意义、原则及框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6 期。

③钱乘旦:《目标、路径与方法:钱乘旦论区域国别研究与区域国别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5 年版,第 122—127 页。

④参见赵可金:《区域国别学》,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3 年版;罗林:《区域国别学学科建构与理论创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3 年版;杨丹:《区域国别学:全球视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3 年版;张蔚磊:《区域国别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4 年版;吴小安:《全球中国:区域国别学的跨学科探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 年版;王健:《区域国别学研究导论(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 年版;钱乘旦:《目标、路径与方法:钱乘旦论区域国别研究与区域国别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5 年版,等等。

⑤叶海林,吴俊:《区域国别学还是区域国别学?——对当前区域国别研究发展动态的一点思考》,《拉丁美洲研究》2025 年第 2 期。

⑥陈杰:《区域国别学的学科意义、学科属性与“三大体系”建设》,《国际观察》2022 年第 5 期。

⑦王缉思:《世界政治的五大目标》,《国际政治研究》2016 年第 5 期。

⑧卢光盛:《一项系统工程:新时期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建设思考》,《思想战线》2023 年第 2 期。

⑨李晨阳:《再论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科建设》,《世界知识》2021 年第 18 期。

体化、区域治理、共同体<sup>①</sup>。赵可金教授等则提出区域国别研究的“三大范式”:分别是文明主义范式、国家主义范式和全球主义范式。在本体论层面,文明主义范式侧重文化和文明研究;国家主义范式强调民族国家研究;全球主义范式的研究主体更为多元和复杂。在认识论层面,文明主义范式坚持经验主义,国家主义范式推崇理性主义,全球主义范式则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并重。在方法论层面,文明主义范式倾向于人文学科方法,国家主义范式强调社会科学方法,全球主义范式二者并存<sup>②</sup>。

## (二) 区域国别研究的既有方法思考

在学术史上,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有一个不断发展与丰富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学界更多使用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方法,例如语言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方法<sup>③</sup>。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方法至今仍然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方法。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区域国别研究的重镇从英国逐渐转移到美国,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开始进入区域国别研究,尤其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对其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21世纪以来,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快速发展的深刻影响之下,基于数据库建设的大数据分析成为区域国别研究不容忽视的方法<sup>④</sup>。就方法创新而言存在三种路径,一是方法原创,二是对其他学科研究方法进行“借鉴+改进”,三是融合不同研究方法。在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体系建设过程中,通常采取“拿来主义”和“博取众长”的做法<sup>⑤</sup>。

基于既有研究不难发现,区域国别研究“跨学科”的研究倾向面临严重的现实学科壁垒,其理论和方法创新并不是“另起炉灶”,更多是打破现有学科间的“不可通约性”,构建起以具体国家与地区为研究对象,强化不同学科间对话与合作的学术体系。换言之,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不是对其他学科的替代,而是以“跨学科”为导向,以“灵活性、松散性构成对学科的补充机制”<sup>⑥</sup>。罗林教授认为,区域国别研究的本质就是“围绕实体研究对象构建‘整体的社会科学’”<sup>⑦</sup>。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区域国别研究虽然涉及诸多学科,但是它并不整体地包括这些学科,试图将所有人文学社会科学都纳入区域国别研究之下是不现实的。诚如麦金德所言,“实际情况是所有科学的界限,必然是天然地折中的……知识是统一的整体,它的分化成各个学科是对人类软弱的一种让步”<sup>⑧</sup>。然而,区域国别研究所提出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事实性的,它们无疑蕴含着丰富的理论意义。在理论创新过程中,对作为整体的国别与区域进行“对象化”和“概念化”虽然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任务,但是依然是可行的。

## 二、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理论创新的三个层面:国家、地区、全球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sup>⑨</sup>本文强调在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自主知识体系中,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为基本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其学术体系构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事实上,区域国别研究并不是孤立的国家或地区研究,它实际上涉及由小到大且相互关联的三个层次:国家、地区、全球<sup>⑩</sup>。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这三个层面。一是国家层面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不管是大国、强国、富国,还是小国、弱国、穷国,都面临现代化的时代任务,并且涵盖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现代化理论对于各个

①郭树勇:《区域国别研究方法导论》,载郭树勇:《区域国别讲演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7页。

②赵可金,刘军:《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定位与发展空间——赵可金教授访谈》,《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5期。

③李强:《关于区域与国别研究方法论的思考》,《欧洲研究》2020年第5期。

④宋伟:《大数据应用于国际问题研究的意义及其局限——以〈国际安全态势感知指数2016〉为例》,《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6期。

⑤陈杰:《区域国别学的学科意义、学科属性与“三大体系”建设》,《国际观察》2022年第5期。

⑥牛可,刘青:《区域和国际研究:关于历史和“原理”的思考——牛可副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5期。

⑦罗林,邵玉琢:《国别和区域研究必须打破学科壁垒的束缚——论人文向度下的整体观》,《国别和区域研究》2019年第1期。

⑧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1页。

⑨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⑩石斌:《略论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外交流研究》2025年第4期。

学科具有统领作用,对具体国别研究具有解释的普遍性,有助于丰富“多元式现代化”的理论探索,更有助于基于特殊性实践的普遍性理论创新。二是地区层面以区域治理理论为核心,其研究主体更为丰富,既包括区域组织,又包括各个类型的国家,同样汇聚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实践领域,正是区域国别研究“跨学科”“多学科”属性的典型表现。三是全球层面,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理论为核心。虽然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并不是纯粹的学术理论,但是其强调的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为区域国别研究理论创新提供了“全球”视角,具有不容忽视的启发价值。或许以上理论并未突破既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范畴,但相信随着区域国别研究的不断深化,尤其是针对不同于西方知识体系“本土知识”的不断挖掘,区域国别研究有望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即区域国别研究的专业知识可以在差异化实践中建立起全球理论化的基础,而全球视角可以让区域国别研究摆脱学术“偏狭化”的局限<sup>①</sup>。

### (一) 国家层面:现代化理论

虽然当前资本、技术、信息、劳动力流动的速度和数量都在不断增加,加之新的区域和全球工具也在不断出现,但是区域国别研究的中心目标——主权领土国家并未消失。在区域国别研究中,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处于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信奉不同的价值体系。因此,“世界的整体图景类似于由性质各异的板块镶嵌起来的拼图”<sup>②</sup>。然而对于任何国家而言,现代化是各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涉及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军事现代化等多个领域。现代化理论对于分析各个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解释各个国家发展的成败得失,预测各个国家发展的路径选择具有普遍的解释力。

现代化理论用于解释社会内部的现代化过程。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借鉴了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社会学分析以及对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理论的部分解读,并受到哈佛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著作的强烈影响<sup>③</sup>。1991年以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冷战的结束是对现代化理论乃至普遍历史的确认<sup>④</sup>。不过,现代化理论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思想范式,经常被等同于西方化。而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正是对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理论的超越。

当前西方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讨论很容易陷入与西方现代化“二元对立”的话语陷阱,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加强对其他国家现代化路径的分析与研究,可以弱化这种话语对立,丰富“多元式现代化”的理论影响。在这一研究过程中,通过对其他国家现代化路径的认知进一步深化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革新。有学者指出,多元现代性的关键要义在于,受不同文化传统与社会政治环境的塑造,会产生多种不同文化形态的现代性。并且这些各具特色的现代性,在价值观念体系、社会制度等诸多层面,未来仍将持续呈现出显著差异<sup>⑤</sup>。换言之,“多元式现代化”承认世界是多元变化的,避免将自己的现代化路径强加于其他国家,而是努力做到费孝通先生始终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sup>⑥</sup>。区域国别研究长期以来侧重大国研究,或者西方研究,尤其欧美等国是重中之重。然而这种研究倾向很容易陷入西方与东方、进步与落后的“二元对立”。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则更多强调非西方世界研究,探究多元世界的可能,将国别置于更为丰富的维度内进行思考。

### (二) 地区层面:区域治理理论

这个世界是一个由地区构成的世界<sup>⑦</sup>。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全球治理举步维艰,国家治理

<sup>①</sup>John W. “The New Mediterranean Studies: A Mediator between Area Studies and Global Studies”, *Mediterranean Studies*, 2013, 21(2): 152.

<sup>②</sup>谢韬,陈岳,戴长征,等:《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定位、基本内涵与发展路径》,《国际论坛》2022年第3期。

<sup>③</sup>Andrew C. *Politics and Paradigms: Changing Theories of Change in Social Scie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44-64.

<sup>④</sup>Francis F.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 pp. 68-69.

<sup>⑤</sup>Dominic S, Jens R, Shmuel N. *Reflections on Multiple Modernities: European, Chinese and Other Interpretations*. Boston: Brill, 2002. p.1.

<sup>⑥</sup>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上)》,《群言》2005年第1期。

<sup>⑦</sup>Peter J.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

挑战重重,区域治理则成为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应对跨国挑战,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的优先路径选择。时至今日,国际社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区域组织,涉及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领域。鉴于此,在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体系构建中,区域治理可以包含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富国与穷国等多个类型的国家,研究主体更为丰富;可以汇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正是区域国别学“跨学科”“多学科”属性的典型表现。而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只是单纯地研究具体国家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一国家,将其置于更大的框架之下进行分析是必要的,这个框架就是地区维度。例如,研究新加坡即离不开“东盟”这一地区框架。因此,强化地区维度的区域治理理论研究是区域国别研究理论突破的重要方向之一。

区域治理是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中间形态,是当代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选项。区域治理的内在逻辑强调以跨行政区划的协同机制取代单一国家主导模式,通过构建区域本位的问题识别框架、决策分析范式及资源配置方案,实现地区事务治理的尺度重构(scale reconfiguration)。作为一种理论工具,治理长期以来被应用于政府公共政策的分析<sup>①</sup>。当前,逆全球化现象不断突显,全球治理失灵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争论<sup>②</sup>。区域治理进而成为各国、各地区应对逆全球化负面效应的重要方式,并且构成“全球治理最重要的一部分”<sup>③</sup>。因此,区域治理是指,在具备特定政治安排的地区中,通过设立公共机构、确立公共权威、制定管理规则来维持地区秩序、满足并增进地区共同利益的一系列活动与过程,实质上是地区内各类行为体共同管理地区事务的多种方式的总和<sup>④</sup>。区域治理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实践。概言之,即各国依托于地区性国际组织,针对涉及经济、政治、安全的诸多地区性事务进行协商、制定规范、采取措施、实施管理。

通常而言,区域治理具有三大属性。一是各国频繁互动形成一个治理网络。这种互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二是区域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也是各国在互动中构建的一种共同体。三是区域涉及多个层次的行为主体,即国家的、区域的、全球的,甚至企业、个人都可以参与其中。区域治理的这些属性,使得区域治理理论在区域国别研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张云在区域治理理论中提出,区域治理的变量包括区域连结(regional connectivity)、区域建制(regional institutionalization)和区域大国(regional power)。其中,区域连结是监测和评估区域治理的依据,建制化程度代表区域治理的水平,区域大国的霸权属性是区域治理中的关键因素。区域治理的运行机制包括区域协同机制、区域管理机制、区域监测机制。其中,协调是柔性的管理,管理是协调的制度化,协调和管理是治理的主要内容,监测使其更加科学<sup>⑤</sup>。除此之外,张蕴岭教授基于“区域”这一概念提出“国际区域学”。国际区域的研究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基础研究,聚焦于地缘和国家研究;二是功能研究,侧重政治、经济、文化在区域中的功能作用分析;三是制度研究,强调对区域制度与治理的探究<sup>⑥</sup>。

### (三) 全球层面: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理论

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全球视角不能“缺位”,是各国置身其中并且深受影响的环境要素。荷兰学者彼得·范德维尔(Peter van der Veer)即指出,地区研究的最大优势在于它可以将“国家”置于全球背景之下<sup>⑦</sup>。并且随着全球化在各领域的快速发展,某种程度上,全球研究项目已经将传统的区域国别研究纳入一个更庞大、更健全的学术单位<sup>⑧</sup>。而在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和 2025 年,中国相继提出全球发

①张云:《“国际社会”理论下的区域治理模式研究:东南亚的视角》,《当代亚太》2013 年第 2 期。

②秦亚青:《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4 期。

③俞正梁:《区域化、区域政治与区域治理》,《国际观察》2001 年第 6 期。

④吴昕春:《论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地区治理》,《现代国际关系》2002 年第 6 期。

⑤张云:《东南亚区域治理:理论、实践与比较》,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163—185 页。

⑥张蕴岭:《国际区域学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5—28 页。

⑦Peter V. “Area Studies in a Changing World”, in Josine S, Paul V. *What about Asia? Revisiting Asian Studies*.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41.

⑧John W. “The New Mediterranean Studies: A Mediator between Area Studies and Global Studies”, *Mediterranean Studies*, 2013, 21( 2): 149-154.

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进而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全球”视角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路。其中,全球发展倡议强调的发展合法性、全球安全倡议突出的伙伴关系网络、全球文明倡议侧重的文明互鉴论、全球治理倡议围绕的多边主义都是对部分西方国家强调的民主合法性、盟友关系网络、文明冲突论、单极主义的路径创新,致力于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就全球发展倡议而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必然是在和各国分享发展、共同进步中才能实现的。一是共同发展作为目标。发展是全球各国面临的普遍任务,如何实现共同繁荣与发展,绝不是中国一家的事情,而是全球各个国家需要努力的方向。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发展进程,既能推动本国经济的繁荣跃升,也可强化区域内各国经济的协同互补,构建互利共赢、协同共进的良性生态。二是发展作为路径。发展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sup>①</sup>,让世界共享中国的发展机遇与成果,是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全球矛盾做出的最优回应。共同发展作为路径,意味着各国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开放包容是其主要特征,互利共赢是其根本追求。

就全球安全倡议而言,共同安全的国际环境对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一是共同安全作为目标,主要强调安全是双向的,自己安全也要保证他国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sup>②</sup>中国强调的共同安全,摒弃了以军事同盟为基础的片面安全观,不赞成采用排他性的集体防务安排再次割裂世界,主张以共同安全作为国际安全合作的方向和基础。二是共同安全作为手段,主要强调维护共同安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一方的努力是不行的,只有各方形成合力,才有可能建立新的国际安全模式。共同安全一方面是指树立共同安全的理念,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诉求,不将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对方不安全的基础上,努力避免恶性循环的“安全困境”。另一方面是在行动层面,只有各国通过共同的安全行动,中国与各国才能实现安全问题的有效治理。

就全球文明倡议而言,“四个共同倡导”是其主要内容,即“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sup>③</sup>。全球文明倡议主张不同国家、不同地区自主探索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是致力于美美与共的大美之道。例如,季羨林、金克木等一代大家对印度文化的深入研究,在国际学术界都有广泛的影响,是全球文明倡议真正的践行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sup>④</sup>。

2025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sup>⑤</sup>。全球治理倡议不仅是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的中国方案,更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它推动区域国别研究从“描述性、孤立性”走向“分析性、关联性”,从“西方理论依附”走向“多元理论创新”,从“纯学术研究”走向“学术—政策—实践联动”。随着全球治理倡议在全球范围内的实践深化,区域国别研究将进一步聚焦“全球议题的区域回应”“区域实践的全球意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智力支持。

### 三、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方法应用的三个导向: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

当前学界围绕区域国别研究方法论展开的探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演绎逻辑与归纳逻辑、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的理论分歧。在当下的学术语境中,亟须突破这些争论的局限,积极探寻一条能够有机

<sup>①</sup>魏玲:《大变局中的中国世界定位》,载张蕴岭:《百年大变局:世界与中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年版,第208页。

<sup>②</sup>《习近平: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新华网,2014年5月21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5/21/c\_1110792116.htm。

<sup>③</sup>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3月16日。

<sup>④</sup>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3页。

<sup>⑤</sup>习近平:《凝聚上合力量,完善全球治理》,《人民日报》2025年9月2日。

融合区域国别研究人文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的创新路径<sup>①</sup>。长期以来,人文学科偏重事实研究,即“是什么”(what)的问题;社会科学强调规律研究,即“为什么”(why)的问题;而区域国别研究还涉及政策研究,即“怎么办”(how)的问题。不过有效的决策无疑基于研究者详细的、客观的基础知识(“是什么”的问题),以及对于研究对象相应特征与趋势的精准理解与科学预测(“为什么”的问题)。具体而言,“是什么”是描述性知识,构成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为什么”是学理性知识,构成区域国别研究的内核;“怎么办”是应用性知识,构成区域国别研究的功用<sup>②</sup>。当前,区域国别研究无疑正处于一个自我革新的过程中。在具体研究方法中,本部分基于区域国别研究的三个问题导向进行分类:在“是什么”的导向中,文献研究法和田野调查法是对相关国别与区域基本知识获取与掌握的方法,突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以及归纳的逻辑倾向;在“为什么”和“怎么办”的导向中,案例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大数据分析法是对相关国别与区域知识更深层次的因果分析,突出研究对象的普遍性以及演绎的逻辑倾向。

### (一)“是什么”的导向:文献研究法和田野调查法

在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中,两位“本尼迪克特”的实践对我们开展具体研究极具借鉴意义。一是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她本人并未去过日本,但是她的《菊与刀》<sup>③</sup>一书充分利用文献分析法,成为研究日本民族性格的经典之作。二是安德森·本尼迪克特(Anderson Benedict),他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sup>④</sup>一书基于其在印度尼西亚的田野调查,进而开辟了基于“非西方国家”历史经验的民族主义理论新流派。詹姆斯·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等书也是通过田野调查实现理论突破的典型案列。如果斯科特不去深入了解村庄里面普通农民和富农之间的互动,则往往只能提供一些宏观的、偏结构性的解释。但是深入当地之后,斯科特看到更多细致的互动,从而给出充分的而非空洞的解释<sup>⑤</sup>。由此可见,文献研究法和田野调查法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方法,能够为理论创新提供重要的方法支撑。

文献研究法(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是对特定国家、地区形成初步认识积累、发现研究问题必不可少的方法。在区域国别研究中,文献研究法作为基础性研究方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明确研究课题后,研究者需系统搜索、整理相关文献,并对其进行深入剖析,最终通过撰写文献综述的方式,阐述个人学术观点,为后续研究工作筑牢知识根基。这一方法能够助力研究者全面、系统地掌握研究对象所在国家、地区特定领域的历史沿革、现实状况与发展趋势,从而深入阐释研究内容,推导出科学的研究结果。例如,江忆恩的《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sup>⑥</sup>是中国研究的里程碑式作品。该书通过对包括《武经七书》等军事类文献、孔孟哲学类文献、《明臣奏议》等政治类文献进行解读,梳理出了两种战略文化,即孔孟理想主义文化与“居安思危”或强现实主义文化。此外,江忆恩研究了明朝永乐至万历年间对外用兵的有关奏折档案,对“主战”和“主和”问题进行量化统计,并结合《武经七书》《孙子兵法》等进行研究。

真正的区域国别研究需要经历一个“浸润和突破”(soaking and poking)的过程,即能够熟练使用研究对象国的语言,深入了解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并且理解其背后复杂的历史文化。区域国别研究之所以强调田野调查,就是考虑到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所以更重视具体的、直观的观察与经验,要求研究者具有“下沉民间,抽丝剥茧”的精神,即杨洁勉教授所言的“亲身参与”<sup>⑦</sup>,突出区域国别研究的“在地性”(site-specificity)。因此,在区域国别研究中,最根本的研究方法是田野调查法,又被视为“必

①李强:《关于区域与国别研究方法论的思考》,《欧洲研究》2020年第5期。

②秦亚青,孙吉胜,杨丹,等:《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与学科建构》,《国际论坛》2022年第6期。

③Ruth B.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47.

④Benedict A.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⑤James S.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James S.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⑥Alastair J.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⑦杨洁勉:《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思考》,载郭树勇:《区域国别讲演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要的旅行”(necessary travel)<sup>①</sup>。田野工作被戏称为区域国别研究者的“成年礼”,是否有田野工作的经历,常常被用作一个区域国别研究专家合格与否的衡量标准。

田野调查法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手段,强调研究者以沉浸式的方式,深度融入目标国家社会或特定人群的生活场景,通过长时间的实地观察、互动交流与亲身体验,系统探究其文化特质与生活方式。田野调查法具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参与观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又被称为居住体验法,是田野调查中极为重要的一种资料收集方式。该方法强调调查者深度融入当地社会,通过全方位参与当地人的生产、生活实践,以第一视角直接观察各类文化现象与社会问题;或是选择长期居住于当地社群之中,以沉浸式体验的方式,深入感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二是深度访谈法(depth interview),又名访问法,注重于与选定调查对象开展深入且持续的交流对话。这一方法综合运用正式访谈与非正式访谈两种模式,旨在深度挖掘调查对象的观点、经历与情感。

## (二)“为什么”和“怎么办”的导向:案例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和大数据分析法

区域国别学成为交叉学科下设的一级学科,其中“交叉学科”的概念并非指称某一独立的具体学科,而是体现了“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的方法论思想<sup>②</sup>。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必然存在针对特定国家或地区某一特定现象或问题的原因分析、措施研究,案例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和大数据分析法无疑是解决“为什么”和“怎么办”问题的核心方法。其中,小样本研究通常采用案例研究法,中等样本研究倾向使用比较研究法,大样本研究则普遍使用大数据分析法。

案例研究法(case analysis method)的运用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每一个个体总是带有群体或总体的典型特征,可以从个别中抽象出一般来。案例研究法不仅仅是对具体事件的描述,更要积极探究事件产生的具体情境,并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措施。因此,案例研究法聚焦于解答“如何实现改变”“演变成因是什么”“最终产生何种结果”等关键问题,涵盖独特的研究设计逻辑、专门的资料收集策略以及别具一格的资料分析手段。凭借其对社会事实进行严谨且深入剖析的能力,案例研究法在理论的验证与拓展进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该方法通过对具体案例的细致探究,挖掘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与内在规律,不仅能为既有理论提供实证支撑,还能推动理论创新与完善。正因如此,案例研究法备受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领域研究者的青睐,成为开展学术研究、解决实际问题时广泛采用的重要方法。在政治学领域,它助力研究者剖析政治现象与政策实施效果;于管理学中,可用于分析企业管理模式与战略决策;在社会学范畴内,能够深入解读社会结构与群体行为;而在经济学研究里,也常被用于解析经济现象与市场运行机制,充分彰显了其在不同学科领域的重要价值与广泛适用性。

比较研究法(comparative study method)是科学分析的基本方法,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由于其固有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尤其需要“比较研究”的视角。基于此,社会科学领域广泛存在如比较政治学、比较社会学、比较法学等诸多二级学科。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必须拥有历史的、文化的、全球或地区的、比较的、中国政治的“五大”视角<sup>③</sup>。其中,比较的视角基于国别与区域的共性和差异,能够对研究对象形成“由表及里”“由浅及深”的深刻认知,进而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理论突破的可能性。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李普塞特特别强调,“一个只了解一个国家的人基本上不了解任何一个国家”<sup>④</sup>。因此,国别研究构成了比较研究的基础,而比较研究则能够推动国别研究的发展。在区域国别研究中,进行比较是不可避免的,研究者有必要对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组织、制度、文化等问题进行比较分析。例如,马克斯·韦伯深刻地意识到,要想进行诚实的比较研究,就必须深入开展我们现在所说的区域国别研究。韦伯关于宗教社会学的几卷著作,无论存在什么局限和缺陷,都是基于对区域国别研究的尊重。

在区域国别研究中,比较研究法依据不同维度可分为以下类型:第一,按属性数量划分,分为单项比

<sup>①</sup>Susan H, Patrick J. *Necessary Travel: New Area Studies and Canad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8.p.169.

<sup>②</sup>余江:《构建区域国别学理论体系宜“戒急用缓”》,《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

<sup>③</sup>李晨阳:《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多维视角》,《世界知识》2017年第24期。

<sup>④</sup>Lipset M. “Pacific Divide: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 Japanese Uniquen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993, 5(2): 121.

较和综合比较。单项比较是针对国家或地区的某一种属性开展的对比;综合比较则围绕国家或地区的全部(或多种)属性进行。第二,从时间与空间维度区分,可分为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横向比较是对同一时间、空间上并存事物的既定形态进行对比,例如比较同一时期不同国家的对华认知态度,或是不同国家的对外经贸指数。纵向比较属于时间维度的比较,通过对比同一事物在不同阶段的形态,以认识其发展变化过程,进而揭示发展规律。比如,对中美贸易数据、领导人互访情况、旅游人数等进行纵向比较,能够更全面地把握中美关系变迁的趋势与特征。第三,依照目标指向分类,可分为求同比较和求异比较。求同比较旨在探寻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共同点,从而总结其发展的共同规律;求异比较则聚焦于比较两个国家、地区的不同属性,以凸显彼此差异,发现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通过“求同”“求异”的分析比较,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国家发展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第四,根据比较的性质,可分为定性比较与定量比较。任何事物都是质与量的统一体,因此在科学研究过程中需要同时把握事物的质与量。定性比较通过对比国家间的本质属性,来确定国家发展的性质;定量比较则是对国家间属性进行量化分析,从而精确认识其变化。第五,按照比较的范围,可分为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认识与研究,既可以从宏观层面整体把握,也可以从微观角度细致探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宏观比较通常是对国家、地区层次的要素比较;微观比较通常是对社会、个体层次的要素比较。

大数据分析(big data analysis)是运用高级分析技术对海量且类型丰富的数据集进行处理,这些数据集涵盖了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以及非结构化数据。鉴于此,“信息的爆炸化需要国别与区域研究机构加强数据库建设,研究人员要学会运用大数据进行综合研究”<sup>①</sup>。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大数据分析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描述性分析,即将过去的的数据汇总成人们易于阅读和理解的形式。尤其是在分析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间段内,或者不同国家在同一时间段内经济发展、政策变迁、社会态度等问题时具有明显的方法优势。例如,针对“中国人在海外的形象问题怎么样”的问题,仅仅通过网络资料很难完全地理解这种观念性的因素,而“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提供了全球范围内的价值观数据。二是诊断分析,即确定问题发生的原因。对于某一国家与不同国家间的关系变迁,可以通过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数据挖掘,为特定问题提供更为深入的洞察。例如,区域治理是区域国别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区域治理涉及多族群分布、地理空间资料和生态环境评估。随着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将区域治理中的历史数据与案例数据进行收集,继而开展变量提取、参数设定和模块创建等工作,能够有力地推进区域治理成效评估体系的搭建,进而发现问题,及时更正,推动区域治理迈向高质量发展。三是预测分析,侧重对未来进行预测。它通过数据挖掘、机器学习、数据分析等各种大数据技术来使用历史数据和实时数据。这些分析产生的数据可用于大选预测,对相关国家政局变化、政策调整进行提前预案,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例如,复旦大学复杂决策分析中心唐世平教授团队利用基于行动者的模型(Agent-Based Modeling, ABM)<sup>②</sup>技术,准确预测了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2020年美国领导人选举和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

## 结语

区域国别研究是“大国之学”,一方面只有拥有全球利益的大国才具有深入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迫切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也只有大国有能力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进行高水平、原创性的区域国别研究<sup>③</sup>。回顾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史,可将其简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前半叶由英国引领,服务于其殖民扩张需求的知识体系探索;第二个阶段是二战后由美国引领,服务于其冷战对抗需求的知识体系探索;第三个阶段则是21世纪以来,由中国引领,服务于以“共生”为内核的知识体

<sup>①</sup>李晨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别与区域研究范式的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0期。

<sup>②</sup>ABM是一种计算机模拟方法,它可以用于研究个体行为规则如何产生宏观的规律和组织,从而建立微观行为体和宏观结果之间的联系。详见Joshua E. *Generative Social Science: Studies in Agent-Based Computational Model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sup>③</sup>谢韬,陈岳,戴长征,等:《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定位、基本内涵与发展路径》,《国际论坛》2022年第3期。

系构建<sup>①</sup>。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强调的“共生”理念突破了西方主流理论占据主导地位的求“异”路径,并且超越了其“二元对立”的内在逻辑;主张求“同”路径,强调“和合共生”<sup>②</sup>,进而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根”与“魂”。不可否认的是,这一过程将是漫长的,任务将是艰巨的,但是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这一事业值得我们全心全意地去探索、去奋斗,进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行稳致远。

## An Unavoidable Task: Rethinking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Area and Country Stud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LIANG Yunwen & YANG Fei

(China-ASEAN Research Institute,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Abstract:** While Area and Country Studies has become a first-tier discipline under the interdisciplinary category, it must have its own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systems to evolve into a truly independent discipline. This is an unavoidable task for constructing the system of Area and Country Stud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For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the Area and Country Studies, three levels should be emphasized, i.e., the national level focuses on modernization theory, the regional level emphasizes regional governance theory, and the global level deepens the theories of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GDI),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GSI),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GCI),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GGI). The applic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Area and Country Studies mainly centers on three orientations. For the question of “what”,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d fieldwork method are prioritized, highlighting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 logical tendency of induction. For the questions of “why” and “how”, the case study method, comparative study method, and big data analysis method are emphasized, highlighting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 logical tendency of deduction.

**Key words:** Area and Country Studie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methodological application;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责任校对 徐宁)

<sup>①</sup>王健:《区域国别学研究导论(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18—32页。

<sup>②</sup>卢凌云:《共生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浅析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基础本体论》,《思想战线》2023年第2期。